

文化交流下的歷史印記： 論陳映真和黃春明小說中的美國人 形象建構

陳正芳

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助理教授

中文摘要

以美國（人）作為寫作題材可以說是六、七〇年代對異國形象描述的大宗，其中有兩方面值得我們注意，一是美國大兵、酒吧和性工作者是大部分作家關注的人物和範疇；二是這類作品以陳映真和黃春明的創作最多且最受討論。本文就是以此為論述的基礎，前者讓我們發現集體想像物和刻板印象的生成，美國人的正面形象，恐怕不再只是台灣人的洋奴心態和美國對台的新殖民可以解釋完整。所以我要重新討論作者「看」的主觀位置是如何被建立，或者說作家們如何吞吐外來者所提供的社會性的感覺與思慮。在對應於當時的時代氛圍，我以為美國人形象投射出的是「脫貧」的庶民文化與知識分子的焦慮，此正服膺於現代主義和鄉土寫實的文學主流。因此，當我們進入陳映真和黃春明兩人的小說文本時，我們有了可以解釋關於作者主體認知的概念，甚至可以說美國人的形象製作主要是傳遞如何在政治戒嚴的時代展開對台灣文化主體的批判和反省。

關鍵詞：美國人、形象、陳映真、黃春明

**Historical Authentication
of Cross-Cultural Interchange:
A Study of Establishment of American's
Representation in Chen Ying-Zhen's
and Huang Chun-Ming's novels**

Chen, Cheng-F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s & Literature,
National Chi-N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ocus of the Americans is often found in the literary work in 1960s and 1970s about the representation of exotic culture. Two dimensions worth further discussion. Firstly, most of writers show great concern towards American soldiers, bars and prostitutes. Secondly, among the works in 1960s and 1970s, most are composed by Chen Ying-Zhen and Huang Chun-Ming; Chen's and Huang's works attract most attentions. Taking these two dimensions into account, this paper therefore aims to research the collective imagination and generated stereotypes of the American, particularly about American soldiers, bar and prostitutes in those novels.

The positive image representation of the American no longer could be explained comprehensively from the Taiwanese people's slavish mentality or new colonialism of America to Taiwan. Hence, I had to rethink how these novelists' subjective positions were established to observe such lives. We then might realize how the novelists absorbed the social reactions and anxiety brought by the foreigner in Taiwan. People no longer considered the image of American being associated with the popular culture of getting rid of poverty and anxiety of the intellectual when living in the political circumstance at that time. By doing so, such thoughts naturally became the literary mainstream of modernism and local realism in Taiwan.

While we read through novels of Chen and Huang, we were able to elaborate concepts of the novelists' subjective cognition. Moreover, we could understand that the creation of the image of the American mainly transmitted the idea of how people criticize and reflect the Taiwanese cultural subjectivity under the reign of political martial law.

Key word: American, image, ChenYing-Zhen, Huang Chun-Ming

文化交流下的歷史印記： 論陳映真和黃春明小說中的美國人形象建構¹

一、前言

「形象」(image)²原是物體的外顯狀態，是一種可見的呈現(a visible presentation)，諸如：肖像、畫、圖形等視覺客體。然而，形象還可以是形而上的概念，是一種獨立自足的意義，例如英雄、烈女等。存在主義大師沙特曾在《影像論》(*L'Imaginario*)一書中耙梳及批判歷來哲學界的形象論述時，說道：「影像是現象的範圍……從我們人類的角度上加給它一個實體性。」³如此說明形象可以是不存在或是不在場的，透過想像創造而出，恰似東方主義之下的「東方」。所以說「形象本身是一個介乎兩端的中項。一端是純然的存在，於此，對象為人所經驗；另一端是思想，於此，它變成觀念，讓對象顯現，讓對象作為一被表象者地存在。」⁴由此我們可以導出：形象作為一個(或數個)現實(或對象)的複製，就包含了多層次的詮釋面向，一如書寫，作者固然給予文字意義，文字卻在閱讀過程另被建構意義。換言之，一本書若未經閱讀，它只是個擺設，唯有讀者的介入才能使它鮮活的存在，這正是讀者反應論所說的：文學是一種動態的藝術，是存在於讀者的閱讀之中⁵。於是形象成了被觀視的客體，

¹ 此為國科會計畫 NSC96-2411-H-260-008 的部分成果。感謝北大孟華教授在比較文學形象學上的提點，以及本學報兩位匿名審查人的寶貴意見。

² Image 的中譯有形象、影像等，本文的論述均採用形象一詞，若為引用文章則尊重原譯者或原作者之寫法。

³ Sartre, Jean-Paul 著，魏金聲譯，《影像論》(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2年)，頁13。

⁴ 這段話乃現象學學者杜夫潤(Mikel Dufrenne)所言，轉引自 Iser Wolfgang 著，岑溢成譯，〈閱讀過程中的被動綜合〉，收於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台北：東大出版社，2004年)，頁79。

⁵ 龍協濤，《讀者反應理論》(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頁13。

「看到」成了可以討論的命題，因為經由注視者的不同文化與歷史進程，形象以文化他者來展示自身，並含融注視者的自我闡釋而創造意義。此外，形象學提醒我們形象不當只著重在客體的範疇，還應當檢視形象的主體化過程，或者說，形象是「對一種文化的再現、通過這種再現，創作了它（或贊同、宣傳它）的個人或群體揭示出和說明了他們生活於其中的那個意識型態和文化的空間。」⁶於是形象研究就不在談論形象與實體的相似與否，或是在文化建構工程裡，展現的是正面形象抑或負面形象，而是透過形象所揭示的文化主體如何被塑造，又是如何與歷史現實展開對話，其中最具討論性的當屬文學中的異國形象。

形象學研究將異國形象的生成，視為「形象」(image)、「幻象」(mirage)和「神話」之間的交互關係，簡要來說，「形象」為製作者親身的感受；「幻象」(mirage)是「迷惑人的，難以把握的形象」⁷，或者說根據二手材料，經過大量想像所做的描述；而「神話」則可定義為「對某一群體具代表性的群體狀態所做的有象徵意味和有誘惑力的描述」(《比較文學形象學》，頁 238)。一般而言，文學中的異國形象大抵有此三種製作角度，但仍須注意的是「形象學拒絕將文學形象看做是對一個先存於文本的異國的表現或一個異國現實的複製品。」(《比較文學形象學》，頁 24)而是如同比叙瓦(C. Pichois)、盧梭(A.-M. Rousseau)和布呂奈爾(P. Brunel)共同提出的：形象是「加入了文化的和情感的、客觀的和主觀的因素，……它喚醒和激起我們不受冷靜的理性控制的好感，因為這種誘惑力只不過是我們自己的夢幻和慾望的噴射。」(《比較文學形象學》，頁 112-113)因此，異國形象的建構總在自我與他者、在地與域外的自覺意識之中，是兩種文化現實的再生產，「若將形象製作者稱為 A，他者稱為非 A，前者只有與後者組成一對關係後才有意義，因為兩者是對立、互補互為參照的。」(《比較文學形象學》，頁 5)這樣看來，異國形象對台灣研究就有加乘作用，因為台灣的存在從來就不是一元的單純空間，而是一個移民社會，加之環海的島

⁶ 此為法國學者 D.-H. 巴柔在〈比較文學的一種研究視角：文化形象〉一文的說法，也由於這個論點建立了比較文學形象學新的里程碑。摘引段落轉引自孟華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2001 年)，頁 24。《比較文學形象學》為目前唯一一本深入形象學理論的中文譯書，共結集 13 篇論文，因本文多次徵引，故在文末直接括弧標明書名及頁數。

⁷ Cadot Michel (米歇爾·卡多)，〈形象研究〉，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2001 年)，頁 98-112。

國特質，外來影響之大不容懷疑。就異國而論，早從十七世紀就有荷蘭、西班牙等西方國家的入侵，馬關條約後，更有影響深遠的日本殖民政權。儘管荷蘭和西班牙介入時間過早且過短，似乎未能留下重要的文學記錄，但當年在政治、經濟和醫療方面等推展，卻在史料、文獻和古蹟中可見遺痕。近二十年來，回顧台灣歷史的文學創作（特別是大河小說），也都重新追索荷、西、日等異國身影，可見要建構自身的文化主體，他者（在台的異國人）的參照是具有文化流動特質的台灣所不可忽略的。但是，面對台灣持續加增的國際交流，尤其是外配和外勞的引進，要完整地討論台灣文學中的異國形象，恐怕不是一篇論文即可完成，故此，我將聚焦在國府遷台以來最有影響力的異國形象——美國人⁸。

美國之於台灣，不管是政治、經濟、軍事，甚或思維、教育制度等都有著直接或間接的引導作用。日治時期，台灣先是透過中國五四運動和日本翻譯接收歐洲和美國的現代思潮，開始在人文思想和文學創作上與美國相遇。隨後，日本戰敗，台灣復歸中國，特別地是在國民政府來台接收之前，早有多批美軍⁹先後來到台灣，短暫的接觸雖未能展現影響力，卻預示了日後軍防的介入。1951年5月美軍在台成立軍事顧問團，早期人數曾多達二千四百人，雖然人數隨年遞減，但為時二十七年又十個月的軍事協防，不可能不對台灣人民造成影響。而在1965年，因為美軍插手越戰，顧問團便設置數處供美軍補給和渡假的美軍招待所，台灣瞬間成了美軍的後勤基地，據估計七〇年代初來台的美軍就高達了二十萬人¹⁰。此番實體的接觸，讓台灣人對西方形象有了具體的投射對象，邱貴芬在其論文〈「在地性」的生產〉的後記中特別寫下六〇年代初期的親身經歷，她回想彼時隔壁洋房住進了一個美國黑人大兵，遂開展了「對那遙遠『西

⁸ 趙綺娜以歷史學者的身分觀察五〇到七〇年代的台灣社會，曾結論美國文化是當時台灣最具影響力的外國文化。見趙綺娜，〈觀察美國——台灣精英筆下的美國形象與教育交換計劃，1950-1970〉，《台大歷史學報》第48期（2011年12月），頁146。

⁹ 一九四五年的五月三十一日美軍B-24轟炸機群，曾對台灣進行最慘烈的轟炸，當時是針對日本帝國，所以並不是實質上的美台交會。此段歷史參照曾建民的《1945破曉時刻的台灣》（台北：聯經出版公司，2005年），序章V、頁90。

¹⁰ 關於美軍在台的歷史資料，乃參考《中華民國年鑑》之「外交與僑務篇」。另根據《工商時報》1991年10月3日的報導：1965年至1966年來台美軍20079人，1967年至1970年來台美軍170311人。隨著戰爭的逐漸升級，來台美軍也急遽增加。70年代初，最保守的估計就有20萬美軍來台渡假。

方』國度的無限遐想。」¹¹翻閱論及六〇到七〇年代的台灣小說，應當會發現邱貴芬的個人記憶，其實也反映了冷戰後台灣人民的集體記憶，而當邱貴芬因兒時經驗對美國留下第一印象是「科技」和「富有」時，美國便從具體「形象」轉化為「神話」，正是巴柔所以為的「集體想像物」。表面看來，六、七〇年代的美國形象呼應了薩依德在《東方主義》一書中提及巴佛和克羅莫認為：「東方是非理性的、墮落的、童稚的、『不同的』」；西方是理性的、美德的、成熟的、「正常的」¹²。西方是強有力的、清晰明白的、東方則是遙遠曖昧的、被征服的國度¹³。實質上，薩伊德借取的觀點是來自西方自身的自我形象建構，重點在講述透過描述東方，展現西方的霸權。而台灣對美國的描述雖有想像的成分，卻更多是屬於記憶和歷史的層面，為呼應美軍在台的歷史脈流，具體的美國人形象在六〇年代中葉以降的小說開始有較多的呈現，例如陳映真的〈六月裏的玫瑰花〉（1967）、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1972）、〈小寡婦〉（1975）和曾心儀的〈酒吧間的許偉〉（1977）等等。

比較文學的形象學家認為「任何一個外國人對一個國家永遠也看不到像當地人希望他看到的那樣。這就是說情感因素勝過客觀因素。」（《比較文學形象學》，頁 113）台灣作家面對這些來去台灣的美軍，其筆下的美國人可能不是原生文化背景孕育下的他者，而是作者們感情經驗下的他者。當然我們可以進一步問的是這些作者的感情經驗為何？也就是說作者「看」的主觀位置是如何被建立？冷戰之下，美帝在第三世界的後殖民政治恐怕是他們的感情經驗基礎，在此經驗之下，美國人形象所反映的將不只是一段歷史記憶，而是更多地展示生活於其中的那個意識型態和文化空間，以及自我夢幻和慾望的指涉。前面段落所引小說之例，在過往的文學研究中，比較會從後殖民的立場著手，比方說歷史學者林瑞明認為陳映真和黃春明的相關小說「作品中重疊的主題是台灣社會中普遍存在的美國陰影。」¹⁴這個陰影在其他的論文被深度解釋為對台灣人

¹¹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產：從台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收於《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年），頁 359。

¹² 艾德華·薩伊德（Said, Edward W）著，王志宏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頁 55。

¹³ 同註 14，頁 79。

¹⁴ 林瑞明，〈目的與手段之別——試論黃春明與陳映真〉，《歷史學報》第 25 號（1999 年 12

洋奴心態的批評，或是揭示美經濟帝國在台灣的新殖民，台灣受到經濟上的剝削¹⁵。實際上，美國這個符碼在冷戰後的第三世界，確實被視為權勢和進步的象徵，美國大夢成了昇華個人的可能。根據趙綺娜的論文我們知道美國為了圍堵共產勢力，提供獎學金和文化交流等活動，吸引各國菁英分子訪美，台灣在五〇到七〇年代政商文教等都有派員出訪交流或學習，菁英返國後提供的美國見聞多為正向，自然為美國人形象增值。下文我們還會從文學創作進行更細微的分析。除此之外，異國形象是在形象製作者和形象本身互為參照，才可能有意義，若就陳映真這位形象製作者為例，我們在他的自白中發現，經由哲學層面思考問題的可能。陳映真在八〇年代的訪談提到：「大部分我的小說中，美國人毋寧只是個工具罷了」¹⁶，針對此「工具」一說，就值得我們在洋奴心態之外，另尋批判的生機，也就是說我們可以用文化現象來看美國人形象是怎樣在文學上重複和變化，從對比中（自我與他者）擴大文學閱讀的面向，並經由不同時期的再現演變，思考文化產品和社會結構的相應關係以及運作機制，換言之，文化現實下的意識型態將如何在形象這樣的物質層面上反映出來？又是多大程度的反響？當然這樣的反映其實是相對於自身的反省而來，透過他者呈現的文化主體或許有更多的迴旋空間。本文首先要釐清美國人形象如何成為台灣數十年來的集體想像物及其意義，其次，檢視六、七〇年代以美國人在台灣為敘述主軸的短篇小說中，黃春明和陳映真的作品無疑最具代表性，除了涉及美軍及越戰的篇章：〈六月裏的玫瑰花〉、〈賀大哥〉（1978）、〈蘋果的滋味〉、〈小寡婦〉外，還有關於入主台灣的美商企業：〈我愛瑪莉〉（1977）和〈夜行貨車〉（1978），我們可以藉此六部作品以異國形象做為「工具」來梳理作者的文化主體建構，並企圖在閱讀異文化介入歷史過程中，開展新的視角，希冀可以超越歷來後殖民的批判角度，落實文本與時代的對話，進而達到重新理解歷史的可能。

月)，322頁。

¹⁵ 參見余素、林文華、徐秀慧等人論文。楊照在〈論黃春明的小說——試圖與悲劇周旋的小人物們〉中將黃春明的〈小寡婦〉等小說視為以民族主義為主要議題的後期小說，這幾乎是討論這些小說的基本論調，似乎除此框架美國人形象，就別無討論的價值，這或許也說明了何以研究台灣小說中的異國形象稀少的的原因。

¹⁶ 陳映真，《思想的貧困——訪談卷：人訪陳映真》（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頁36。

二、社會集體想像物下的「美國人」詮釋

我們知道文學中的美國人形象以文化他者來展示自身，含融描述者（作家）的自我闡釋而創造意義。誠如美軍在台所帶來的性交易和酒吧文化，讓美國人的形象多在此一範疇打轉，這樣的現象不只標舉了一個時代，最後還異變為社會集體的想像物（*imaginaire, imaginary*）¹⁷。文藝創作者在歷史回顧的當下，不免循此文化他者的形象來說故事，因為文化中的異質最易產生衝突，而衝突是故事性的基礎，除了六〇、七〇年代的在台美國大兵敘事，八〇、九〇年代續有類同作品生產，最為人熟知的作品例如：王禎和的小說《玫瑰玫瑰我愛你》（1984）及吳念真的電影《太平·天國》（1996），這個社會集體想像物（美國人）究竟創造了何種意義，是我們可以進一步思考的。

（一）在體驗記憶與想像記憶間的美國大夢

以年齡而論，王禎和的書寫其實是個人親身經歷的回顧，吳念真既有成長背景的記憶，還需加上二手材料的參照，雖說兩人出生家園、年代和成長環境都有差異，但是數十年的越戰美軍駐台卻在不斷書寫的累積當中，形成一種特殊表現的型態，二十世紀的九〇年代，較吳念真年輕一個世代的陳克華¹⁸，用詩作記錄台灣的六〇年代，其中寫道：

愛人不見了
哪裡去尋找-----

¹⁷ 形象所具有的強大感染力，在流行文化最易覺察，林積萍在討論台灣七〇年代的通俗文化時，認為有部分接引美國流行文化。林積萍，〈論台灣一九七〇年代通俗文化的集體想像〉，《東海中文學報》第21期（2009年7月），頁376-379。或者我們依此解讀美國文化亦是當時台灣流行文化的一環，如此看來透過流行文化的大量傳送，美國自然成了社會集體想像物，同時也有了符號學研究的刻板印象：「人類進入信息時代後由大眾傳媒迅速普及的『思想的現成套裝』。」（《比較文學形象學》，頁192）。然而，巴柔借用社會學家所用的這個詞彙，卻是要處理形象更複雜的層面，特別是異國形象，他認為異國形象是「社會集體想像物的一種特殊表現型態：對他者的描述（*representation*）」（《比較文學形象學》，頁121）。

¹⁸ 黃春明、陳映真、王禎和、吳念真和陳克華的出生年代分別是西元1935、1937、1940、1952、1961年。

在那條因越戰而興旺起來的吧兒街
 穿中國旗袍的台灣小女人
 以日本小女人的淒婉口吻
 唱著越南小女人愛唱的情歌
 挑起了美國大兵多毛的性慾與東方的鄉愁：¹⁹

吧兒街、台灣小女人和多毛的美國大兵顯然是來自集體記憶下的形象傳播，我們發現這裡的「美國人」只是對過去文化現象的重複書寫，「美國人」的意義固然被台灣六〇年代的文化現實填滿，但在八〇乃至九〇年代的作家筆下，它可能揭示批判意識恐怕比六、七〇年代還要強烈。所以在二十一世紀的研究中，學者更明白地揭示越戰美軍和後勤基地的在地性工作者關係，展現了「台灣男性面對美軍在種族、軍事與經濟上的強勢，主動獻上同族女性的『身體』以求自身利益時，不僅止於『自我去勢化』、『自我陰性化』，甚至不惜藉由『自我死亡化』，主動消弭自身的存在，提供在地父權的空隙，將自身對同族女性的控制權完全讓渡與美軍。」²⁰若僅論陳克華的同志身分，以及縱覽全詩，或可以為通過此一形象的描述，另有他個人的文化意識型態，然而詩中的歷史切面確實只看到強勢的美軍性消費者及弱勢的東方女生的性工作者，台灣男人是缺席的。由此還可進一步說明異國形象「說出關於自身文化（「注視者」文化）有時很難設想、解釋、承認的東西。異國形象可將本民族的一些現實轉換到隱喻層面上去。」（《比較文學形象學》，頁 123）

美國駐軍來台期間，固然為台灣帶來十億美元的外匯和色情、毒品、性病及混血兒等社會問題，但是美國的霸權後殖民，使得文學作品中的美國人形象，成為台灣在文化主體上自我認同的隱喻，並彰顯出台灣社會扁狹的「崇洋」心態²¹。李昂在短篇小說〈蘇菲亞小姐的故事〉揭示了此一現象：

¹⁹ 這首詩題為〈愛人不見了——紀念歌詞裡的六〇年代〉的新詩，於 1995 年發表於中時副刊，後結集成《美麗深邃的亞細亞》詩集，於 1997 年出版。陳克華，〈愛人不見了——紀念歌詞裡的六〇年代〉，《美麗深邃的亞細亞》（台北：書林出版社，1997 年），頁 62。

²⁰ 朱慧足，〈台灣與沖繩小說中的越戰美軍與在地性工作者：以黃春明〈小寡婦〉與目取真俊〈紅褐色的椰子樹葉〉為例〉，收於陳建忠主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新竹：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 年），頁 246。

²¹ 七〇年代談接待美軍的酒吧文化小說，當然不全然「崇洋」，曾心儀的〈酒吧間的許偉〉

於是在那樣人口不及十萬的美國中西部小大學城，開始有傳聞蘇菲亞小姐的男朋友並不是什麼上等人，事實上只是一個駐台美軍的二等兵，不過，許多人倒同意，因為所有的美國人在台灣都是上等人種，蘇菲亞小姐受到羨慕到可能是真的。只是，一旦來美國後，發現掃廁所、清垃圾的也是美國人，他們對於在台灣能進出 P.X. 高級餐廳的美國人，與在台灣時會有的評價當然不同了。²²

當「美國人」等同「上等人」的心態成為文化上的普遍共識，「美國人」也被神話化為幸福的指標，美國自然成為使台灣人「升級」的場域，七等生的小說寫道：「美國的生活方式，不幸一直是落後地區的人所嫉妒的對象。……」²³ 甚至小說中的人物還直言：

我離開美國，就不停地懷念著那個地方……那邊的每一件事都叫你舒服；那種自由的生活，是不曾去過的人所沒法想像。……你在那些城市裡，開著車通過那些偉大的街道，那些有秩序的人群；那長長的金門大橋，太陽遠遠地落著。……沒有人干涉你；你愛怎麼樣，就怎麼樣。²⁴

當然七等生是有反省力的作家，他在另一篇小說提出他的疑惑：「畢竟我要走了，李說我要到天堂去了。樂園，這應該是台灣的，何以美國成為了我們觀念中的樂土？……」²⁵ 與陳映真、王禎和同世代的七等生，必定經歷了美軍在台的歷史現實，上面摘引的兩段敘事皆出自《離城記》這部短篇小說，寫作時間在 1972 到 1974 年之間。事實上，七〇年代的台灣「有兩股歧異的社會現象逐漸形成：一部分因著國家在外交上孤立而返國助陣的留學生，結合本地知識分子的自覺，為本土民族意識高漲加溫；另一部分人喪失對國家的信心，而選擇

透過吧女的口說出駐台美軍「又窮，又沒修養，又老油條」，或者許偉用「下賤的鬼子」來咒罵洋人嫖客，但是在不滿次級對待，進而對洋人拳打叫踢之後，還是疑懼地說：「他是美國人，好惹的嗎？」。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曾心儀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 年），頁 180、190-191。

²² 此文李昂在 1977-1978 留學美國時所作，共有〈蘇菲亞小姐的故事〉之一和二兩篇。李昂，〈蘇菲亞小姐的故事〉，《李昂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頁 106。

²³ 七等生，《七等生全集 4·離城記》，（台北：遠景出版社，2003），頁 82。

²⁴ 同註 27，頁 83。

²⁵ 同註 27，頁 157。

他鄉（特別是對美國的憧憬）做故鄉。」²⁶因此，儘管七等生對本民族的「崇美」現實中提出質疑，他還是想將「美國」設定為一個參照值，他的文化現實比較是從當時的知識分子著眼，至於他羨慕美國所給予的對「自由」的想像，就如同他始終以「隱遁者」自居的個人風格。「美國」要對照的是讓七等生格格不入的台灣，他在小說〈削瘦的靈魂——跳出學園的圍牆〉中，以敘述者的口吻，表達在師範生畢業考前夕被告知無法畢業後的心理與生理的反應，其中他與常人不同的學習風格，讓有留美經驗的老師說道：「依教育的觀點看，你是整個教育錯誤的焦點；照美國人的說法，你是個了不起的學生，整個教育史都要感謝你。」²⁷接著七等生又寫到：「畢竟是放洋的，事事能比較，一個在美國受教育的人與土生土長在台灣的人真有天壤之別。」²⁸實際上，不管是作品內部或是作品書寫者七等生所呈現的美國觀點，都是二手資訊，因為要突顯台灣教育或當時戒嚴體制的專制，美國人的形象被設定為作風民主、讓人自由自在的幻象。回到歷史現場，此幻象的產生並非無中生有，中國時報由楊澤主編的《懺情錄》記錄了台灣的七〇年代，書中多位作者提到當年深受美國文化的影響，對楊澤來說自由的觀念來自 Dylan 的音樂，對舒國治來說「美國」是一無所有、設施醜惡的台北所「抽析出來的趣樂玩意」，對余為彥來說「美國」在他每個成長階段給了不同的夢想²⁹。儘管「美國」文化具現在台灣都會的生活空間，但是年輕的知識分子其實並不真正明白「美國」是甚麼東西，或許誠如楊澤所言：「從威權到民主，美國曾經是台灣社會的一面『鏡子』——心理學上所謂『想像的他人』(Imaginary Other)。」³⁰依此想像他者，回到七等生以異國形象轉換本民族的現實隱喻，我們看到表面上七等生以優劣對比他者和自我，呈現了台灣對美國的迷思，深層來看，他所要表達的比較像是當代知識分子的焦慮。我們不妨再細讀從李昂到七等生的小說全文，將會發現「美國大夢」是社會集體想像所建構而出，有趣的是僅以美軍在台的數年滯留，就有藉由親身接觸後，

²⁶ 陳正芳，《魔幻現實主義在台灣》，（台北：生活人文出版社，2007年），頁117-118。

²⁷ 同註27，頁228。

²⁸ 同註27，頁228。

²⁹ 以上三人說法參見楊澤主編，《七〇年代——懺情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頁4、21、37。

³⁰ 《七〇年代——懺情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頁6。

書寫不同記憶刻痕的美國人形象，而此刻痕在不同世代的書寫者筆下，卻又展呈了某一固定的形式，於是：

真實不是「已在」，而是透過書寫（建構）「存在」。因此之故，我們將面對真實一次次的建構與現實一次次的解構，最終勢必形成某種「真實」或「現實」的神話，某種普遍性的真實信仰歸依與價值判斷準繩，某種名之為「刻板印象」的公定模式。³¹

（二）美國人形象的刻板印象化

刻板印象（Stereotype 或譯為套話）是形象學研究不可迴避的一環，北大孟華教授在〈試論他者「套話」的時間性〉一文中，不僅簡明扼要說明此詞產生的流變，還針對巴柔用刻板印象處理形象的理論，進行討論與修正，我覺得最有意思的是她將阿莫希和巴柔的定義對比後，結論出「借鑑了符號學方法的比較文學形象學，則完全不能忽視形象的歷史層面，因而更專注那些在口頭和書面文學中積澱深厚、具有歷時意義的有關他者的套話。」³²我相信藉由地方誌、民謠、民間戲曲，或民間訪談田調，可以方便我們確立「美國人」形象之「刻板化」的過程，但是這種社會人類學的考證，非本人也非本文可以處理，我倒是在文學作品中看到具有歷時意義的「美國人」刻板形象，例如：高鼻子、藍（綠）眼睛、體型高大等，有趣的是這些描述大多是正面意象，廖蕾夫以〈隔壁親家〉為題在八〇年代寫下六、七〇年代的農村記憶，其中一個段落如此描述：

水底寮的村民們對於外國人的印象都是從電視中得來，電視中的外國人鼻子都是高高的，眼睛碧綠得像貓眼，頭髮五顏六色，男的高大英俊，女的美若天仙。現在村民們一聽到迎治真得要嫁給美國人，都感到與有榮焉。對於迎治不名譽的職業也就不在意了。³³

³¹ 陳正芳，〈想像美國與再現本土——從西班牙的《歡迎馬歇爾先生》到臺灣的《太平·天國》〉，《中外文學》32卷11期（2004年4月），頁38。

³² 孟華，〈試論他者「套話」的時間性〉，收於孟華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2001年），頁192。

³³ 廖蕾夫，〈隔壁親家〉，《隔壁親家》，（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頁102。

庶民的「媚外」態度最能彰顯形象從幻象而神話的特質，而此一刻板印象的建立，也正反映了美國（西方）經濟強權的後殖民。薩伊德歸納巴佛和克羅莫對東、西方的刻板印象說道：「東方是非理性的、墮落的、童稚的、『不同的』」；西方是理性的、美德的、成熟的、「正常的」³⁴。另一方面，西方是強有力的、清晰明白的；東方則是遙遠曖昧的、被征服的國度³⁵。基本上，薩伊德認為當西方「描述東方時，所運用的時態是無時間變化的；他們傳達的是，重複宣示西方霸權的力量，強化印象。當東方和西方對比時，東方總是一個對稱西方、但又全然遜色於西方的對手。」³⁶看來台灣將西方神話化，雖然寫作美國和台灣的作者是站在東方的位置，但他們所反映的跟全球下的「東方主義」是饒有相關，也就是說，東方書寫者筆下，透過知識、經驗、想像，以及反覆先行的文化記憶，成形東方，反之亦然。這種來自西方（美國）的權威和力量使得後殖民下的台灣人，會以為相對於美國的是全然遜色的自我，也才会有嫁給美國人的迎治，即便不名譽的行業，也能獲得「升級」³⁷。自我矮化的民族心態，在作家筆下以差別待遇呈現，諸如黃娟的小說寫道：「更氣人的是她接著對傑夫的表现是那麼地大方友善，明顯地表示了她心目中他和傑夫的不同地位。那差別是因『熟』與『不熟』而定，抑或是純粹地根據了『膚色』？即『黃』的老中與『白』的老美？」³⁸或者楊青矗的小說〈陞遷道上〉：「看他在洋人面前低聲下氣的，百依百順。在我們面前卻威風凜凜，作威作福，任意吆喝支使。」³⁹不管是文化現象或是社會現象，考察作品反映的年代，已從美援漸次轉進工業化及都市化，美國人形象或許沒有太大的改變，但是賦予形象的意義，卻顯然有了改變。

不管是社會集體想像物或是刻板印象使然的美國人形象，對應到六、七〇年代的台灣文學環境，正是以存在主義盛行的現代主義文學和鄉土文學相繼當

³⁴ 同註 14，頁 55。

³⁵ 同註 14，頁 79。

³⁶ 同註 14，頁 101。

³⁷ 〈隔壁親家〉在 2009 年改編成音樂劇，這個段落只佔小說極小的篇幅，可是在音樂劇中編導仍選取並作等值的發揮，可見即便二十一世紀的回顧歷史，美國文化仍是強勢的歷史印記。

³⁸ 黃娟，〈相輕〉，《邂逅》（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 年），頁 64。

³⁹ 楊青矗，〈陞遷道上〉，《楊青矗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 年）頁 193。

道的年代，上述提及的小說文本就在這兩股文學脈流中顯現了作者的文學思慮。換句話說，在鄉土寫實的作品中美國人形象無疑是庶民文化力求「脫貧」的象徵，而在都市寫作中，美國大夢只是敘述背景，究其實，美國人形象恐怕更是知識分子在存在主義思維下的自我反思。有趣的是，在庶民文化中，以單向度思考形構的美國人形象，往往製造了小說具荒謬性的喜劇氛圍。所謂單向度的思考我們可用巴柔的說法來理解，巴柔在〈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一文中，歸結塑造異國形象有四個基本態度，其中第一種態度就是將異國文化現實視作絕對優越於本「民族」、本土文化的，然而對異國文化的正面增值，就是對本土文化的貶低，異國的描述也就更趨近「幻象」而非「形象」，這也是一種「狂熱」的態度⁴⁰。我想這裡的幻象和狂熱正是小說荒謬喜感的來源，小說角色或是鄉下人、工人或是妓女唯有透過對異國形象的狂熱態度才能自我提升，相對於知識分子的多愁善感，即使遠渡重洋進入「進步」的美國，他們終究要在主體文化和身分認同的議題上反省與辯駁，其所營造的憂患意識正是小說悲劇的底蘊。當然對異國形象的狂熱態度是美國文化強勢衝擊台灣時，台灣人對美國文化一廂情願的認同，弔詭的是在殖民或後殖民領土上，「每一位西方人，除了展現活力、理性、永遠保持警醒的年輕統治官員形象外，不需要透過臣屬子民的眼光去反射、看到他們自己日益衰頹的事實」⁴¹。於是在台灣人眼中複製了他者給予的形象：理性的、積極的、高大的、富有的，或者說西方化的美國。另一方面，在欺凌、受壓之下，民族意識的興起，使得有部分的台灣人產生對美國的拒斥，視其為「淺薄的、傲慢的、物質主義的、具侵略性的」，於是有了巴柔所以為的第二種態度——憎惡，這在陳映真的小說中特別明顯，然而別忘了陳映真筆下的美國人也只是工具，如果只以憎惡來處理他對異國形象描繪的態度，恐怕有失公允。至此我們只能說，以狂熱態度型塑的美國人刻板印

⁴⁰ 巴柔提出的另外三種態度：二是將異國文化現實視為低下和負面的。對他者的「憎惡」之情，反過來對本土文化發展出正面的增值，導致全部或部分的本土「幻象」；三是異國文化現實是正面的，它在注視者文化中有一席之地，而注視者文化是接受者文化，他自身也被視為正面的，這種相互尊重，讓雙方形象都有正面增值；四是「交流、對話的現象消失了，已讓位於一個新的正在統一起來的整體。」例如泛拉丁主義、泛日耳曼主義等。參見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2001年），頁141-143。

⁴¹ 同註14，頁58。

象並非唯一，同時以憎惡態度的反面敘述是存在創作中的，可惜的是較少人對此憎惡態度進行探討，我以為以此兩種態度交相辯證，將可更具體在意識層次的討論，下文將就陳映真和黃春明兩人的六篇小說來釐清小說文本對異國人形象設定的態度，思考有別於集體想像物的形象，還有甚麼值得我們深入探究以及意義創造。

三、顛覆美國人形象自我投射

延續上述美國人形象在台灣文學另有時代表徵的結論，亦即相應於鄉土寫實而展現「脫貧」的庶民文化，以及相應於都市現代書寫而展現的存在焦慮的知識分子文化。我們在陳映真和黃春明的小說中，看到同樣的兩條脈絡，但是因為兩人是以美國人在台灣的實體操作，而非如李昂、七等生、廖蕾夫、楊青矗和陳克華等人只是觀感和印象的抒發，他們回應文化現象的觀察，將更可以深度解釋。

（一）自我審視、自我反思、自我想像與自我書寫

在進入小說文本之前，我們必須先就作者的心理機制和所處環境再作討論，因為任何形象的構成，或是透過複製或是透過想像，都會受到描述者主觀的心理機制和環境的客觀因素所影響。美國經濟學家 Kenneth E. Boulding 在《形象》（*The Image*）一書中，從「我」是存在於空間、時間、人際關係、大自然和環境，以及情感的情緒世界來思考形象的建構，他說：「形象是由於形象擁有者的所有過去經驗而被逐步建立。」⁴²回顧作者的過去的經驗，身為台灣戰後第一代作家的陳映真和黃春明，他們從出生到成長，恰恰經歷了日本殖民末期、國府遷台初期的混亂與白色恐怖政治。當時的外交政治有美國在台灣的海軍協防和美援政策：美國勢力在東西方冷戰時期進入，美國將台灣設定為遠東地區對中國大陸包圍戰略的最前線；在經濟方面，從五〇年代開始以每年一億美元

⁴² Boulding, Kenneth E., *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pp3-6.

的美援，協助台灣經濟改革，到了六〇年代中期改以投資方式，將跨國資本企業引進台灣。在這樣的背景下，小說家們似乎有了美國人形象的描繪基礎，一如集體想像物的形構，陳、黃兩人的作品也有對異國形象「狂熱」態度的演出，例如〈我愛瑪莉〉裡提到：「外國人向來就不體罰學生」、洋人的時間觀念是「早到和遲到……統統都算不守時。」；〈蘋果的滋味〉裡美國修女使人「想到卡片上帶著翅膀的天使來」；〈小寡婦〉裡開酒吧的老闆說：「要賺，賺美國仔才快。」、「美國人是很肯認錯而挨得起罵的。」；〈賀大哥〉「日晒得發紅的臉，瘦削的、濃眉的臉，蓄著彷彿聖誕卡上的耶穌的鬍子的臉。」表面上，這些正面詞彙是注視者國家用來定義被注視者國家，似乎對他者文化增值，對自我文化的貶值，然而，我以為在評論自我矮化之前，我們需要思考的是，這些詞彙之「正面」意義得以成立，實在是二度西潮下另一波現代化衝擊的結果，所以可以回應的時代話語將會是：提倡愛的教育、建立時間觀念、實踐人性醫療、正視經濟落後問題、掩過敷衍的個人和官僚體系和功利主義抬頭的危害⁴³。因此，對一個異國文化的認同，不全然是他者的優勢位置，可能更多的是對自我的反省，由此可見陳、黃兩人擁有的高度覺醒態度和強烈的民族意識，是可以從異國形象研究中解讀出來。而他們用小說寫就的時代感應，不論荒謬與否，確實都重新建構了台灣的歷史記憶，更有意思的是，在很難展現對美國「憎惡」的年代，小說中竟對美國人形象有所顛覆。

如果說台灣人在欺凌、受壓之下，民族意識的興起，對美國產生拒斥，恐怕要到中美斷交的七〇年代末才比較明顯，從五〇年代開始台灣對美國的觀點就是等同進步、天堂，歸其因可能是，一方面接受美援，經濟環境有待提升，另一方面戒嚴的政治生態，環境的苦悶，使人們嚮往具有自由和富裕形象的美國，於是在文壇有西化的趨勢，在台灣社會則瀰漫「美國化」，學界大老徐復觀也忍不住批評，「指出當時人的心態是寧可『在美國捧盤子，背死屍』，不願在自己國家當一名工人、農人、教師。這就好像一個枯槁的母親，擠出最後一滴

⁴³ 陳映真在一九六五年進入一家在台灣的國際性製藥公司。1975年，又進入另一家跨國性製藥企業。他曾在訪談中提到自己見過許多優秀而善良的美國企業界人士，這可能也是其書寫正面的美國人形象的來源。陳映真，《思想的貧困：——訪談卷：人訪陳映真》（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頁36。

奶把孩子養大，但孩子養大後一有機會站到別人的朱門下，便瞧不起自己的母親。」⁴⁴對美國形象的正面嚮往，是冷戰後第三世界的共相，這可能多少是經由傳媒（電視、電影、畫報、雜誌）流播而形象神話化的結果⁴⁵。比方說陳映真也是直到八〇年代赴美交流時，在紐約坐了一趟地鐵才驚覺「另外一個美國」的存在，相對於遼闊、豐饒、強盛，美國竟有著貧困、疲乏、力竭和茫然的一面⁴⁶。我們知道徐復觀主要是對台灣知識分子行徑的反思，但是徐先生忽略了知識分子面對台灣體制的無奈，李昂在〈一封未寄的情書〉裡提到：「那時節整個鄉土文學的潮流尚未起來，美國在台灣文藝圈成為文化引導者的地位未失，從海外回來的留學生是否到美國新聞處演講，多少關係著能否躋身入某個社交圈……」⁴⁷主導社會思潮和文化主流的知識分子認清美國才是老大的事實，確實是一個時代氛圍所造就出來的，至於工農階層的百姓呢？他們如何面對「美國」呢？或許可以在身為小人物的代言人黃春明的作品中找到答案，他在〈蘋果的滋味〉中用對比性的事物呈現差異，說明了庶民對美國人形象的瞻仰心態。例如：美國大使館的「賓字號轎車」，撞上了工人江阿發「破舊的腳踏車」；住在「以木箱板和鐵皮搭建起來的違章矮屋」，來到白宮般的美國醫院的江太太，「她心裡想在這種地方生病未嘗不是一種享受」；帶翅膀的天使的美國修女，奉派來照顧兩腿折斷的江阿發。以上引例正是前述「脫貧」的庶民文化最佳代表，而其「狂熱」態度使得全文展現的荒謬喜感，堪稱一絕。但若從象徵的角度來閱讀，我們可將「小說中的工人與美軍上校，看成象徵中美關係的雙方，那麼對於黃春明的眼力，我們實在不能不佩服。」⁴⁸換言之，黃春明在「狂熱」的態度之下，還是要點明中美關係的不平等，較之〈隔壁親家〉等作，確實更高明一點。

⁴⁴ 轉引自陳昭瑛，《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台北：正中書局，1998年），頁301-302。

⁴⁵ 在《西方主義》一書中提到埃及最有影響力的思想家 Sayyid Qutb 於 1948 年到美國紐約，他批評這個城市是 huge “workshop”, “noisy” and “clamoring”. Even the pigeons looked unhappy in the urban chaos. 他渴望與人的對話不是金錢、電影明星或名車。Buruma, Ian. & Margalit, Avishai.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 pp31-32.

⁴⁶ 陳映真，《思想的貧困：——訪談卷：人訪陳映真》（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頁22。

⁴⁷ 李昂，〈一封未寄的情書〉，《李昂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頁240。

⁴⁸ 齊益壽，〈一把辛酸淚——「我愛瑪莉」序〉，《我愛瑪莉》（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5-6。

相較於〈蘋果的滋味〉濃烈的庶民氛圍，陳映真的〈賀大哥〉則是完全現代主義的知識分子調性，他要回應的歷史現實是：台灣青年逐漸失去國際間的國家主體認同地位，先是釣魚台事件，後是被迫退出聯合國，越戰亦在七〇年代中期終止。或有人以逃避姿態，競相赴美，但民族意識的提升是不容忽略的改變，憤而歸國的青年，試圖改寫歷史，批判美國成了書寫的窗口。於是陳映真借美國人賀大哥之口大肆放言美國理想的沈淪，事實上，賀大哥的理念和意識型態幾乎是陳映真個人的投射，陳映真是個理想主義者，畢生從未放棄他的社會主義思想。施淑曾言：「陳映真的破滅了的烏托邦，他的小說世界，負載著的或許正是漂泊在歷史和現實中的失去了行動力量的台灣菁英分子的憂鬱。」⁴⁹而且他「早期小說的世界人物，似乎已經大勢底定，它的構圖經常是在一個空虛、匱乏、然而平靜的小市民社會中，兀立著一個問題人物，一個緊張地思索著的自我。」⁵⁰無怪乎，林幸謙說：「在文學以外，陳映真是相當少數願意並且有能力去正視經濟、政治和意識型態等課題的作家」⁵¹。〈賀大哥〉這篇小說轉換敘事立場，以美國人發聲提出反美意識，頗有此況味。

陳映真的〈賀大哥〉雖於七〇年代發表，但其美國人形象是除軍人、商人外在台寄居的另一種美國人口，同時也是較少見的小說人物設計。論及小說內容，則是延續了六〇年代以瘋狂來顯現現代主義式的虛無。小說主人翁賀大哥，在越戰後不堪戰場上的回憶，而人格分裂避居台灣，其間引起女大學生「我」的暗戀。女大學生之於賀大哥，是傾吐崇高理想的對象，是心靈的慰藉。在「我」的眼中，賀大哥啟動的愛情是超乎情慾的，小說寫道：

我想著，那麼集中地想著賀大哥，卻不是想著他的溫婉、棕色的眼睛；不是耽想著靠在他單薄卻寬大的胸懷裡，讓他巨大、多骨節而且長滿了茸茸的汗毛的手，輕輕地觸撫我的髮和背……我反反覆覆地想著他說過

⁴⁹ 施淑，〈台灣的憂鬱——論陳映真早期小說及其藝術〉，《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年），頁165。

⁵⁰ 同註58，頁158。

⁵¹ 林幸謙，〈恐怖主義與弱小者的全球化——專訪陳映真評美國「批發式」恐怖主義〉，《明報月刊》39卷4期（460期）（2004年4月），頁70。

的每一句令我五內震顫的話，想著他刻苦的，卻又無由想像的豐富、火熱而又遼闊的世界。(頁 95-96)

因此，當賀大哥被美方家人找到帶返美國之際，「我」衝到機場，想親口告訴他：「賀大哥，振作起來。」在閱讀完賀大哥在越戰之後接受精神醫療的紀錄後，也表示：

賀大哥，在讀完這些文件，便像那武士一樣地消失了。然則卻使我向著一片絢爛無比的斑斕開了眼；而啊絢爛的斑斕之中，也或者將永遠在我的凝思之中，隱約著賀大哥——或者那就人心疼的麥克·H·邱克吧。(頁 125)

賀大哥是作者陳映真的代言人，這裡的美國人載體充斥唐吉軻德式的理想主義，美麗而蒼涼的浪漫姿勢，其實受存在主義思維的影響，雖然他一直是覺醒度極高的民族主義者，但是在美國強勢的經濟、軍事和文化的衝擊下，反省第三世界的落後和被動，難免有理想難伸的無奈，儘管呂正惠對此強烈地不以為然，但也認為陳映真把知識分子的無力感當作基本事實呈現出來，「這種無力感是一個『歷史處境』的問題，而不是『存在處境』的問題」。他要批評的歷史處境是國民黨的外來政權政治型態，知識分子因之而有了「不知如何自我定位的『存在困境』」⁵²，對比美國知識分子面對越戰的陰影，國人其實同樣受制於反共的政策主潮，也就是說陳映真的左翼精神藉由批判越戰得到抒發。換言之，六〇年代末期先進國家的左傾運動深深觸動了陳映真，他曾在訪談中說明此一現象：「其中尤以美國人為甚，反對越南戰爭、反對種族歧視、反戰歌曲銀搖復興運動、校園裡的言論自由運動等等，毛澤東從醜惡的敵人變成西方左派的英雄，還有卡斯楚格瓦拉、胡志明都變成流行的符碼。」⁵³這不僅是在反共教條下成長的台灣一代，所忽略的歷史剪影，也是對立於共產政權的民主盟國，脫軌而高昂的激烈演出。〈賀大哥〉裡有一個段話這樣寫道：

⁵² 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5年)，頁 19-20。

⁵³ 陳映真，張清志整理，〈我的寫作與台灣社會嬗變〉，《INK》(2004年8月)，頁 40。

「在六十年代，美國也有過類似的運動。」賀大哥用英語說：「那時的美國青年，在一個又一個的運動中，對美國的富裕，提出道德方面的質問；對美國國家永不犯錯的神話，提出了無情的批判。」

那時候還在大學讀書的賀大哥，「曾以為美國的『革命』就在眼前。」

「你簡直就覺得，那美麗的世界已經在望，」他說：「一個新的、美麗的美國啊！」（頁98）

如是之故，我們可以更明白作者對越戰的關切，以在台灣的美國人來表現投射的一種關於文化他者的幻象，它再現了部分美國的現實，但卻一定程度地表現了台灣文化的真實，是台灣主體文化自我審視、自我反思、自我想像與自我書寫的方式，表現了台灣六、七〇年代潛藏文化底層的渴望與恐懼，揭示出台灣社會所處的文化想像與意識型態空間。眾所周知戒嚴體制下的台灣是走右派路線，大多數人面對越戰的態度都是盲目跟從官方的反共政策，陳芳明曾對此反省：「我的七〇年代，曾經為了越戰的升高而興奮，甚至還寫詩歌頌。」⁵⁴相形之下，陳映真對美國人形象去神話化的底蘊，就更展現了他先知先覺的人道關懷和政治覺醒，這不僅是當時大膽的嘗試，也是重讀陳映真令人感佩之處。

根據小說文本所釋放出的悲憫訊息，若從上述處理知識分子的角度來看，小說女大學生和賀大哥的相互慰藉是迥異於描寫吧女之於美國大兵的救贖意涵，這也是接下來我們要進行的討論，亦即從描寫美國大兵形象的小說中探尋當中的女性意識，弔詭的是，這也是彼時潛藏文化底層的渴望與恐懼。

（二）以邊緣人物建立共謀關係推展出的女性議題

1、救贖力量和女性意識

黃春明被譽為小人物的代言人，作品充滿悲天憫人的關懷，一般都指向他早期的文字作品諸如〈魚〉、〈兒子的大玩偶〉、〈籬〉等。實際上，在他自稱轉為社會性較強的小說〈蘋果的滋味〉、〈我愛瑪莉〉和〈小寡婦〉時，也保留著

⁵⁴ 陳芳明，〈激流亂雲〉，收於楊澤主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頁48。

一貫的憐憫色彩，特別是〈小寡婦〉裡，對美國大兵的悲憫之情，既顛覆了「狂熱」的態度，也翻轉了「憎惡」，或許接近「友善」，但又不全然將自我與他者文化現實視為正面，反而是從負面形象著手，給予正面的增值。無獨有偶地，陳映真的小說〈六月裡的玫瑰花〉雖與黃春明的〈小寡婦〉書寫筆法迥異，卻對美國人形象有若干相符的元素。陳映真另一篇短篇小說〈賀大哥〉，保留對越戰的批判，但對於美國人的角色充滿同情寬待，間接顯現出陳映真的立場望之激越，實則寬厚。透過小說表彰的憐憫情懷，我們發現對美國人形象的閱讀將一掃殖民主義的既定模式，而是與殖民帝國的邊緣人物建立共謀關係，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就像〈小寡婦〉裡面吧女和黑人的連結：

十一年前剛出道的時後，是在台北的紅玫瑰酒吧出勤。那時認識一位黑人官史密斯。他使她嚮往美國，使她以為去了美國就可以擺脫所有的痛苦。看在這份上，她也就不在意他是黑人了。史密斯還說：「你是黃種人，我是黑種人，我們都是一樣的有色人種。跟我們不同的是白種人。」說到白種人，還咬了牙說。（頁 128）

這是吧女阿青的回憶，也是她美國夢的開始和幻滅，黃春明點出的是有色人種的相互依存關係。而這種關係，在陳映真的〈六月裡的玫瑰花〉發揮地更完整。〈六月裡的玫瑰花〉的小說情節，主要是圍繞著上等兵巴尼（Barney）和吧女艾密麗。當艾密麗自慚於吧女以及養女（從小就被賣出去的女孩）的身分，巴尼卻安慰她：「一百年前，我們曾經像牲口般被拍賣！可是你瞧，現在我是個軍曹哩……。」（頁 14）靠著彼此的憐惜，兩人最終竟發展出夫妻般的愛情。

如此看來，陳映真和黃春明都採取了女性的救贖力量，表現對於邊緣或是弱勢美國人的悲憫之情，同時女性在此不單只可以被男性消費的形象視之，更有著翻轉性別與階級的可能，這和薩伊德所舉的福樓拜和埃及舞（神）女庫加的例子不甚相同。福樓拜認為東方女性「不過是機器，他們分不清這個男人和那個人有何不同。」於是「東方不只是暗示生育力，還象徵性的允諾（及威脅）、永不疲乏的肉感、無限的慾望」⁵⁵在陳映真和黃春明的小說裡，吧女的行

⁵⁵ 同註 14，頁 268-270。

業原是如同大眾文化所販售的商品一般，有標準規格，但在反越戰的主旨下，東方的性取而代之的是反剝削和相互慰藉的功能。〈六月的玫瑰花〉裡上等兵巴尼，從越戰戰場休假的一星期，在台灣酒吧間尋求慰藉，並愛上吧女艾密麗，誓言娶之為妻，可是在一夜狂歡後，巴尼病了，他對精神科醫生娓娓道出越戰的陰影：

「你分不清他們誰是誰——他們看起來都一樣。扁平的臉、斜翹的眼、黑色的棉布衫。而我只有一個人，你相信我嗎？」

「我完全相信你。」醫生說：「我沒忘了你是在一個戰場上。」

「我昏睡在那個矮小的房子外。」軍曹輕輕地說：「直到我們的部隊開來。他們說我把整個村莊打爛了。」（頁 24）

巴尼住院期間，艾密麗每天送上一朵玫瑰，整整一個六月裡。這樣的愛情讓巴尼超脫人生的各種不公平待遇：祖先是奴隸、母親跟白人苟合以維持家計、自己被迫在越戰濫殺無辜。他說：

「在醫院的時候，我對我自己說：平生第一次，有個人使我覺得我自己有多重要。那個人就是你，我的小麻雀。我又對自己說：平生第一次，我的生命裡有了一個目的，為它奮鬥……」（頁 29）

〈小寡婦〉的女性救贖力量是小說結尾處的轉折。兩個十九、二十的美國大兵——湯姆和比利，因為打死三十二名越共得以休假來台灣玩。黃春明讓比利大醉、湯姆服用迷幻藥（LSD）來表示美國軍人在越戰的精神壓力。接待兩位士兵的吧女菲菲和桂香各自擁有悲傷的生命故事，但對比利和湯姆卻竭力溫柔以待。菲菲甚且從廟裡求取一平安香包送給比利，願他沙場上平安。兩年後，比利回到台灣尋找菲菲：

比利放開菲菲的手，把大衣的另一邊掀開，讓菲菲看。但是菲菲沒看出什麼，也沒注意。

「我的左手沒有了。」

菲菲弄清楚是什麼事的時候，露出因為難過而變形的臉，僵住了。比利反而安慰她說：

「總算你救了我的命！」

菲菲僵傻的望著他。

「你知道？」比利伸手到胸口掏出那紅色的小香火袋說：「我一直帶在身上。湯姆他們都死了，只有我回來。我，……」(頁 212)

一般文學評論將〈小寡婦〉裡吧女競相出賣肉體賺取美金的行徑，視為道德淪落或台灣男性的缺席，我卻以為吧女具有另類的象徵意義，也就是說我們應該回到美軍來台消費台灣女性的歷史語境裡，重新檢視吧女與士兵的關係。六〇年代美國加入越南戰爭，反共雖是堂皇的征戰宗旨，但戰爭所帶來的毀滅力量，使這些參戰的美國士兵陷入生死存亡的威脅和濫殺無辜的心靈傷痛，在東亞各國尋找吧女成為撫慰空虛的可能，然而在〈六月的玫瑰〉和〈小寡婦〉中都提升了慰藉的層次，從上述節選的小說段落，看到的是透過吧女的安撫，美國士兵得到了救贖的力量。

2、混血兒／養女形象的國家認同指涉

陳映真和黃春明以悲憐的角度型塑的美國人形象，牽涉到在六〇、七〇年代或是更早的在歷史細縫生存的女性。如同上文意欲跳脫女性作為消費的形象，而找尋到藉由救贖力量所形成的女性意識，我們另外在小說中還看到屬於歷史名詞的養女，在小說中浮出歷史地表，或者說一直是西方藝術消費的東方女性（性工作者）在本文所討論的小說文本中，以一種生命奮鬥的精神創造歷史意義。但在國族議題上，或許我們可以進一步處理以女性取代台灣的隱喻問題。

從二十世紀初開始透過普契尼的歌劇《蝴蝶夫人》⁵⁶（1904）、好萊塢電影《蘇西黃的世界》（*The world of Suizie Wong*, 1960）以及百老匯音樂劇《西貢小姐》（1989），我們看到西方男性在亞洲消費東方女性，以及東方女性忠心的守候，這樣的主題在越戰開打後的台灣，不只是藝術作品的特例，而是現實生活

⁵⁶ 《蝴蝶夫人》歌劇是根據美國導演兼劇作家大衛·貝拉斯可原作改編而成，而這部戲劇作品劇情取材自美國業餘作家約翰·魯特·隆之中篇小說。

的一環。檢視陳映真的〈六月裡的玫瑰〉和黃春明的〈小寡婦〉，我們都閱讀到相同的場景。〈六月裡的玫瑰〉吧女艾密麗愛上了黑人軍曹巴爾奈並為他懷上孩子，「那一定是個漂亮的、黑色的小男孩，伊想著：眨著一對大大的金魚眼，像他的父親一樣。」〈小寡婦〉吧女阿青寄望去美國享福而愛上黑人士官史密斯，並生下兒子小黑。兩者的戀人也都一去不復返，不同的是巴爾奈戰死沙場，史密斯因吸毒被遣返美國；小說結尾艾密麗雖不知噩耗，但她終要面對現實，就像阿青重回酒店上班養育自己的兒子。這裡已經不是催人熱淚的愛情悲劇，或是挪用東方女性製造異國情調或是性幻想，而是台灣邊緣女性的生命奮鬥史。

在此之下，和美國人產下的私生子是比個人更大的社會及民族難題，小黑這個缺乏家庭溫暖的混血小孩，讓人傷透了腦筋，阿青如此詮釋自己的感受：「想到小黑，她覺得那不是一個人對一個人的事。好像她一個人對著一個極大的什麼，而被壓下來。」黃春明寫作此文的 1975 年雖早於國家領導人蔣介石過世兩個多月，但是台灣處於戒嚴的壓力依然存在，中美關係也逐漸生變，台灣的國族議題就像中美混血兒般，夾在美國和傳統中國之間有著身分建構的兩難。換言之，一方面要靠美國援助和支持在國際上的中國正統地位，一方面反共復國收回中國大陸的夢想越來越遙不可及，七〇年代的台灣人民豈不也面對著一個極大的、無以名狀的壓抑嗎？而此種身分不確定，在小說中「養女」議題上，也可得到證明。

台灣養女⁵⁷的傳統延續百年，養女制度的出現通常源於經濟狀況不佳的家庭。黃春明的〈蘋果的滋味〉，工人江阿發車禍住院，其大女孩阿珠便陷入要當被父母賣給人家作養女的想像中，雖然為了家庭阿珠沒有過去的害怕，而且「她一味地想著當養女以後，要做一個很乖很聽話的養女，什麼苦都要忍受。」雖然有些養女的際遇很好，但畢竟都是個案，從阿珠的自言自語可見養女制度加諸女性生活的恐懼，這是蔑視人權的傳統。而在〈六月裡的玫瑰〉的艾密麗說道自己是從小被賣出去的那種養女，她的母親也是，外祖母也是，或言之，她的養女身份是家族的宿命。當陳映真將之對映於巴爾奈的黑人奴隸史時，可以

⁵⁷ 關於台灣養女制度可參考盧彥光的碩士論文《清代台灣養女制度之研究》及游千慧的碩士論文《一九五〇年代台灣的「保護養女運動」：養女、婦女工作與國／家》。

很清楚看見作者意在強調邊緣族群歷來未能解決的人權問題。從妓女到養女，小說補充了缺頁的歷史，也再次說明台灣在八〇年代以前的社會景象，是在身份不確定間游移，是在個人生命衝動和民族生命衝動努力的時代。

回到巴柔所分析的四種態度來看，〈賀大哥〉、〈六月裏的玫瑰花〉、〈蘋果的滋味〉、和〈小寡婦〉的美國人形象分別是從「狂熱」和「憎惡」的態度出發，但卻又都指涉到自我主體的構成，正如 Iser 所言：「形象照顯了某種東西；而這種東西既不同於所與的經驗對象，因為它超越了感覺的範疇，也不同於所表象的對象之意義，因為它還不曾概念化。」⁵⁸可見作家們的注視眼光是在自我和對象的感覺結構中遊移，越戰經驗因在美軍駐台的歷史下，成為作家自我感覺的歷史經驗，所以說〈六月的玫瑰〉、〈小寡婦〉、〈蘋果的滋味〉和〈賀大哥〉的美國人形象是六〇年代的歷史產物，那麼，無疑地黃春明的〈我愛瑪莉〉和陳映真的〈夜行貨車〉便是七〇年代的美國記憶，而在此記憶圖景小說中的美國人是跨國經濟進軍世界的主角，新的經濟形式從都會開始，小說投射的自我自是無法以鄉土的庶民或現代的知識分子截然二分，反倒是美國人形象進入另一個歷史階段。

（三）以刺點（punctum）視角探索美國人形象的負面意涵

七〇年代台灣的政治仍處於戒嚴時期，但民間的反對力量也在暗處醞釀，此時最大的危機是台灣逐漸失去國際間的國家主體認同地位，美國與台灣關係在七〇年代是愈走下坡，直至 1979 年的中美斷交，是最致命的一擊。反之，經濟互動卻隨新一波的國際分工崛起，有所改變。七〇年代歐美國家將需要勞動力的工業生產，轉至發展中國家，於是形成勞工密集的出口導向經濟。美國對台灣的經濟援助隨全球經濟結構轉變有所調整，跨國企業公司入駐台灣漸次取代多年的美援政策。故此，台灣小說中的美國越戰士兵由公司企業的美國老闆或主管所取代，〈我愛瑪莉〉和〈夜行貨車〉可為代表。

⁵⁸ Iser, Wolfgang. 著，岑溢成譯，〈閱讀過程中的被動綜合〉，收於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台北：東大出版社，2004 年），頁 79。

薩伊德曾說：「每個書寫東方的人，都應該將自己與東方的關係做好定位而後轉介入文本」⁵⁹，或言之，每個書寫他者的人，都應該有一套與他者相應的論述定位（position）。陳映真曾兩度任職於美商藥廠，而黃春明則在美商的聯通廣告公司上過班，所以說他們在涉及美商公司的小說中寫入美國人，是先從自身經歷的觀察著手。台灣評論界閱讀黃春明的〈我愛瑪莉〉，最喜以「批判洋奴心態」為著眼，因為小說主角大衛，先從名字的洋化開始，到不愛老婆只愛美國上司留下的雜種狗瑪莉為終，的確是崇洋媚外具代表性的扁形人物⁶⁰。而陳映真的〈夜行貨車〉雖也從美商公司著手，但小說探索的方向比較複雜，除了經濟殖民的國族議題外，還包含外遇、本省、外省族群等社會問題。儘管如此，台灣評論界的焦點還是擺在經濟和社會的後殖民性。其中我不能完全苟同的是將留學、在美商工作的行徑都歸為「知識分子甘為西方殖民主義之買辦」，我們不該忽視在崇美留美的熱潮背後，因緣台灣經濟尚在起步，為求生存赴美或在美商工作尋找希望，實在是一個時代的特別需要⁶¹。

其次，若將本文所討論的小說作為六、七〇年代美國人形象的剪影，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關於知面（studium）和刺點（punctum）的攝影理論⁶²，很能幫助我們擴展觀視美國人的角度。簡言之，知面是照片的主體，是觀者用他的文化知識背景所理解的影像整體；而刺點就有如照片的細節，或者照片中脫逸觀賞者理知所建構的美感，而是令人不舒服的畫面一隅。在美國人形象裡，我們會以慣常的西方主義視角，注意到小說裡面美國人都是壯碩的、高大的、精瘦高挑的等「知面」形象，然而，更引人興味的是小說中的「刺點」，我覺得「刺點」顯現的美國人形象恐怕是更富有寫真的意義。

⁵⁹ 同註 14，頁 27。

⁶⁰ 英國福斯特的《小說面面觀》將小說人物分為圓形人物和扁形人物。前者指稱性格複雜的角色，後者為性格單一，總是隸屬一個層面上的角色。

⁶¹ 西元 2000 年後的台灣，由於國內研究所大量成立，政府反而推動青年出國留學。

⁶² 羅蘭·巴特為其興趣相片提出兩種元素：知面（studium）與刺點（punctum），前者指觀者本有文化知識背景的延伸面，「指對一項事物用心，對某人有好感，是種一般的投注，無疑具有熱忱，但不特別深刻劇烈。」，刺點「因為此字又有：針刺、小洞、小斑點、小裂痕、還有擲骰子碰運氣的意思，相片的刺點，便是其中刺痛我（同時謀刺我，刺殺我）的這一危險際遇。」。Barthes, Roland. 著，許綺玲譯，《明室——攝影札記》（La chambre claire）（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5 年）頁 36-37。

現在僅就美國人在小說的角色來看，在黃春明的〈我愛瑪莉〉⁶³裡，美國人的角色是衛門和衛門夫人，衛門是個「趾高氣昂」的上司，衛門夫人是典型的商家貴婦。雖然小說主角大衛陳百般順應的奴才嘴臉，很令讀者嗤之以鼻，但是大衛卻是故意在工作上留有一絲讓老闆挑剔，好「滿足上司的權威感，同時又可以控制上司的傲氣」，並進而讓上司也會「服服貼貼」地讚美他的工作表現。這裡反挫了下對上、奴與主的絕對位置，換言之，讀者往往會注意到作者刻意製造的殖民主義者的嘴臉，卻忽略在此形象的底層還有翻轉的意涵。又如衛門夫人對大衛的態度，是以西方國家的優越感為基礎，明明送給大衛的是自己也不愛的雜種狗，卻再三吩咐大衛要好好愛護，又如他們夫婦私底下談論大衛時，總說「那頭豬怎樣怎樣，那隻狗怎麼怎麼」。事實上，這對夫妻有著貌合神離的婚姻危機，衛門請調回美國，就是希望老婆去看醫生，要不然就是離婚。表面上得勢的美國人背後是不幸福婚姻的負面形象，顛覆東方主義裡完美的西方形象。

同此，在〈賀大哥〉中，賀大哥以嬉皮式的理想主義者樣貌，吸引了台灣的女大學生，但是尋索賀大哥對美國的貶抑：「在美國，自由過頭了，再加上美國的歷史短，美國人又天真，說得不好，有些幼稚，沒有個中心思想」，以及賀大哥的精神分裂病症，被遣返回美的落寞茫然，我們看到小說中的「刺點」。

〈小寡婦〉的「知面」是男主角馬善行採用中國「小寡婦」的異國情調，吸引美國大兵來消費東方的性，於是我們看到唯利是圖的台灣商人嘴臉，以及用西方的想像和凝視建構他者中國，這當然也是一般評論所涉足的論點⁶⁴。只是我看到自我嘲諷之下的戲謔他者，首先，馬善行是在美國讀市場學和旅館經營，並且在美國有四、五年的實務經驗。從他的言談，不僅道出美國反越戰、越戰士兵士氣低落的社會現實，又藉著「中國婦女守寡的由來，比你們美國開國的歷史還要早咧！」點出美國歷史文化的淺薄⁶⁵。甚而，更藉著吧女的想像——「美國人像蕃仔，你罵他『幹你老母』。他說如果他母親願意，他沒有意見。」強化對美國人

⁶³ 黃春明，〈我愛瑪莉〉，《我愛瑪莉》（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1-68。

⁶⁴ 此處論點可參考徐秀慧，〈黃春明小說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1988年），第五章。

⁶⁵ 有論者對這句話的詮釋是擺在貶抑中國文化的落後，但是看看小說馬善行提到運用異國情調的理由是：「美國人沒什麼文化，所以對中國特別好奇」，或許可以理解當中對美國的戲謔之意。

文化水準的質疑。馬善行是對美國有其批判的心態，故絕不能只用商業的投機分子來定位，試看小說中點出：「馬先生說，『小寡婦』的構想，對股東來說是改進經營方式賺錢，而對他來說是跟美國詹森政府開玩笑。」其次是美國尋芳客：有因為吸毒被押送回國的大兵史密斯，有在越戰受到驚嚇而無性功能的大兵路易，還有唱著「We Shall Overcome」後被打死的逃兵荷西。如果仔細觀察這些美國人形象，將發現作者的憎惡態度。更深地看，黃春明並非要貶抑一個國家（民族），而是透過這些負面形象，表現對越戰的不滿，當然還是不脫六〇年代的歷史氛圍。

陳映真的〈夜行貨車〉⁶⁶在時空上延續了〈小寡婦〉的歷史背景，這是「華盛頓大樓」系列小說的第一部。看到華盛頓大樓不難聯想成台北商業區的美商辦公大樓，七〇年代以後的都市榮景。小說重點在描述在美商公司工作的台灣人物生態，美國人上司摩根索不是小說的主角，但卻有活潑的形象展成。他一出場的形象是「狂熱」者筆下的：「高大的身影」、「低沈而滿有活力的聲音」、「瀟瀟灑灑」，然而，陳映真筆鋒一轉，寫道：「摩根索先生在緊張中仍不失他那代表動物一般的精力的惡戲：和女職員作即興式的調笑；說骯髒的笑話；破口開罵。」摩根索藉機在工作上調戲下屬林榮平的情人兼秘書劉小玲，並且故意探詢林榮平的反應，他的形象著實是個令人不快的刺點。這個刺點反映出東西方在階級上的不平等，林榮平的無奈在於：「曾是自己的情婦的女人，受到外國老板的輕薄，卻要幾乎反射性地對這個老板佯裝不知；佯裝自己和那女人之間什麼也沒有。」但是小說結尾處，作者利用另一位男主角以辭職抗議美國上司在言語上的輕浮，他說道：「我，可是再也不要龜龜瑣瑣地過日子！」〈夜行貨車〉是陳映真 1978 年的作品，就在這一句有力的結尾下，也大致結束了美國人在台灣歷史佔重要位置的一頁。也就如小說告終前，歡送劉小玲的酒會上，摩根索質疑：「我們美國商人認為台北比紐約好千萬倍，而你們 XX 的中國人卻認為美國是 XX 的天堂。」儘管劉小玲已獲美國移民簽證，將前往美國，她卻能聰明得體地回應：「我並不以為美國是天堂……」，並且適切地「在『天堂』前面刪去『f...ing』這個髒字。」透過刺點的觀察，我們發現原來在歷史進程中，台

⁶⁶ 陳映真，〈夜行貨車〉，《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 59-112。

灣在政治和經濟上依賴美國，卻在意識上有其思考的獨立性，甚且來到七〇年代末，台灣人的民族自覺和經濟起飛，已將人們的視域擴展朝向多元化的國際認知，前往美國也可能只是人口流動的現象，美國大夢已開始解體。

四、結論

薩伊德揭示了幾個世紀以來西方建構東方的迷思，他所提的論點再度提醒當代學者文化霸權的侵略性，但是面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高度網路化的後資訊時代，人際的往來脈絡幾至無國界的地步，異國通婚比例的上升，在在都警示我們對他者形象的迷思、誤解、與建構，需要新的闡釋機制。有趣的是，「邊緣他者」在小說中依然出現，異質文化中的階級分類，竟反而是全球化下的同質。一如我們檢視台灣小說中從六〇年代和七〇年代的美國人形象，基本上仍有第三世界看第一世界之別，美國人的自大、驕傲，和台灣人的囁嚅、卑微。儘管如此，我們仍能藉由形象學的閱讀角度，讀出跨國文化流動中他者與自我的對話關係。

形象是對文化現實的描述，我們應該認清的事實是，東西方的差異始終存在，至於孰優孰劣，是依舊在歷史的天平擺盪的課題。若是用符號學的觀點來看，台灣文學中的美國人可以是一種象徵語言，在六〇年代的文化體系中傳遞的信息是對越戰的批判，進而被賦予的象徵意義是對苦悶政治的宣洩；在七〇年代的文化體系中，美國人形象傳遞的信息是資本主義跨國經濟的美帝主義，而其象徵的是民族自覺意識的萌生。綜觀本文所討論的美國人形象並無法百分之百對應美國複雜的人口結構，它呈現最多的還是作家的本土關懷，事實上，異國形象總是和本國形象對立、互補和互為參照的。我們在數十年以來重複的美國人形象，看到社會集體想像物的形成，當中對異國形象的「狂熱」的態度卻在強大的影響力之下，讓形象成為刻板印象，一方面這是美國在經濟和軍事上強權的後殖民使然，另一方面這也是從幻象而至神話的異國想像。然而這只是美國人形象探討的起點，若將之對應到六、七〇年代的台灣文學環境，正是以存在主義盛行的現代主義文學和鄉土文學相繼當道的年代，於是美國人作為一種象徵語言的意義就更加突顯了。

本文相信出現在陳映真和黃春明小說中的美國人，像是參加越戰的美國大兵和軍官、教授英文的美國青年、美商企業的美國主管及夫人，以及美國派遣的大使官員，他們的形象在台灣的文化語境中生成是與描述者主觀的心理機制和環境的客觀因素息息相關。雖然陳映真自言鍾理和等前一輩作家可稱為鄉土寫實作家，而自己和黃春明則只是傾向寫實⁶⁷，他的現代主義影響是明顯可見的，黃春明早期的寫作，一向被視為極具鄉土關懷，六〇年代後期轉進都市場域，但其鄉土意識依然強烈。有意思的是兩位同世代的作家在共同的文化背景基礎，雖有世界觀、對世界的主觀知識、處於空間和時間的相對感受，以及在人際關係網中的感受的差異，但在處理美國人形象時，卻都朝向為小人物發聲和在社會寫實的層面上進行。因此〈六月裏的玫瑰花〉等六篇小說都是在寫實的敘事之下，分別反應出庶民階層和知識分子面對美國人的態度，其中的「鄉土」與「現代」並非鄉村都市之別，而是在敘事過程中所呈現的思想取徑和批判精神。整體而論，在美國勢力進入亞洲的歷史事實中，兩人的作品交雜「狂熱」和「憎惡」的態度所提供的獨特視角，不僅是對台灣的政治現實和文化現象提出反省和批判，更是對第三世界受美國帝國主義支配的揭示。雖然我們從美國人形象所出發的閱讀，看到東方對西方的認識，在時間的演進上，有不同的理念駕馭著；在空間的限制上，有反映時代的企圖，但是僅就在台的美國人來認識美國，在批判的角度上還是有所侷限。八〇年代以後，美國人在台灣的書寫日趨減少，也不成創作重點，解嚴後的台灣，用旅行文學紀錄更多「他者」的形象，或許更能體現異國形象所表徵的文化現實。美國大夢固然在自我文化增值下漸形解消，但美帝國主義對弱勢外交的台灣在二十一世紀初並沒有減少其霸權本質，慶幸的國人的自覺意識更為明確，比方說拋開戒嚴的政治包袱，陳界仁以其藝術創作《帝國邊界 I》能更大膽而強烈地對美國提出強烈批判，讓我們在解讀歷史的過去時，對於知識分子的失落感似乎有所機轉，當然這得用另一篇論文持續這個討論⁶⁸。

⁶⁷ 陳映真，張清志整理，〈我的寫作與台灣社會嬗變〉，《INK》（2004年8月），頁39-40。

⁶⁸ 美國加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的白睿文教授近來對台美關係極具興趣，他曾於「台灣文學的感覺結構：跨國流動與地方感」國際學術會議發表“Imperialist Limbos: Chen Chieh-Jen's *Empire's Borders* an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無間帝國：陳界仁的《帝國邊界》與美國夢的解構〉），似乎對此議題有初步的關注。

參考資料

- 七等生，《七等生全集 4、離城記》（台北：遠景，2003 年）。
- 朱惠足，〈台灣與沖繩小說中的越戰美軍與在地性工作者：以黃春明〈小寡婦〉與目取真俊〈紅褐色的椰子樹葉〉為例〉，收於陳建忠主編，《跨國的殖民記憶與冷戰經驗》（新竹：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2011 年），頁 241-271。
- 余素，〈什麼是「蘋果的滋味」？——談黃春明「蘋果的滋味」〉，《夏潮》1 卷 9 號（1976 年 12 月）。
- 呂正惠，〈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論陳映真的歷程及其矛盾〉，《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年），頁 53-73。
- 呂正惠，〈現代主義在台灣——從文藝社會學的角度來考察〉，《戰後台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5 年），頁 3-42。
- 李昂，〈蘇菲亞小姐的故事〉，《李昂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 年），頁 103-234。
- 李昂，〈一封未寄的情書〉，《李昂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 年），頁 235-263。
- 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2001 年）。
- 林文華，〈殖民與反殖民——論黃春明小說〉，《台灣文藝》（新生版）177 期（2001 年 8 月），62-71 頁。
- 林幸謙，〈恐怖主義與弱小者的全球化——專訪陳映真評美國「批發式」恐怖主義〉，《明報月刊》39 卷 4 期（460 期）（2004 年 4 月），頁 69-71。
- 林瑞明，〈目的與手段之別——試論黃春明與陳映真〉，《歷史學報》第 25 號（1999 年 12 月），頁 321-337。
- 林積萍，〈論台灣一九七〇年代通俗文化的集體想像〉，《東海中文學報》第 21 期（2009 年 7 月），頁 371-388。
- 邱貴芬，〈「在地性」的生產：從台灣現代派小說談「根」與「路徑」的辯證〉，收於《重寫台灣文學史》（台北：麥田出版社，2006 年），頁 325-366。

- 施淑，〈台灣的憂鬱——論陳映真早期小說及其藝術〉，《兩岸文學論集》（台北：新地文學出版社，1997年），頁149-165。
- 徐秀慧，《黃春明小說研究》（台北：淡江大學中研所碩士論文，1997年）。
- 陳正芳，〈想像美國與再現本土——從西班牙的《歡迎馬歇爾先生》到臺灣的《太平·天國》〉，《中外文學》32卷11期（2004年4月），頁37-58。
- 陳正芳，《魔幻現實主義在台灣》（台北：生活人文出版社，2007年）。
- 陳克華，〈愛人不見了——紀念歌詞裡的六〇年代〉，《美麗深邃的亞細亞》（台北：書林出版社，1997年），頁61-66。
- 陳映真，〈六月裏的玫瑰花〉，《上班族的一日》（台北：洪範出版社，2001年），1-31頁。
- 陳映真，〈夜行貨車〉，《六十七年短篇小說選》（台北：爾雅出版社，1979年），頁59-112。
- 陳映真，〈賀大哥〉，《上班族的一日》（台北：洪範出版社，2001年），頁77-128。
- 陳映真，《思想的貧困——訪談卷：人訪陳映真》（台北：人間出版社，1988年）。
- 陳映真，張清志整理，〈我的寫作與台灣社會嬗變〉，《INK》（2004年8月），頁28-79。
- 陳昭瑛，《台灣文學與本土化運動》（台北：正中書局，1998年）。
- 陳芳明，〈激流亂雲〉，收於楊澤主編，《七〇年代——理想繼續燃燒》（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頁39-49。
- 曾心儀，〈酒吧間的許偉〉，《曾心儀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頁173-193。
- 曾萍萍，《陳映真小說與後殖民論述》（彰化師範大學國文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年，2000年）。
- 黃春明，〈一個作者的卑鄙心靈〉《我愛瑪莉》（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177-200。
- 黃春明，〈小寡婦〉，《小寡婦》（台北：遠景出版社，1988年），頁93-213。
- 黃春明，〈我愛瑪莉〉，《我愛瑪莉》（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1-68。
- 黃春明，〈蘋果的滋味〉，《我愛瑪莉》（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69-104。

- 黃春明，《莎喲娜啦·再見》（台北：遠景出版社，1977年）。
- 黃娟，〈相輕〉，《邂逅》（台北：前衛出版社，1994年），頁63-95。
- 楊青矗，〈陞遷道上〉，《楊青矗集》（台北：前衛出版社，1992年）。
- 楊澤主編，《七〇年代——懺情錄》（台北：時報文化出版社，1994年）。
- 達尼埃爾·亨利·巴柔，〈從文化形象到集體想像物〉，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2001年），頁118-152。
- 廖蕾夫，〈隔壁親家〉，《隔壁親家》（台北：九歌出版社，2008年），頁85-114。原刊《聯合報》副刊，1980年11月22-23日。
- 趙綺娜，〈觀察美國——台灣菁英筆下的美國形象與教育交換計劃，1950-1970〉，《台大歷史學報》第48期（2011年12月），頁97-163。
- 齊益壽，〈一把辛酸淚——「我愛瑪莉」序〉，《我愛瑪莉》（台北：遠景出版社，1979年），頁1-16。
- 劉小楓選編，《接受美學譯文集》（北京：三聯書店，1989年）。
- 龍協濤，《讀者反應理論》（台北：揚智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7年）。
- Barthes, Roland. 著，許綺玲譯，《明室——攝影札記》（La chambre claire）（台北：台灣攝影工作室，1995年）。
- Cadot Michel（米歇爾·卡多），〈形象研究〉，收於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2001年），頁98-112。
- Iser, Wolfgang. 著，岑溢成譯，〈閱讀過程中的被動綜合〉，收於鄭樹森編，《現象學與文學批評》（台北：東大出版社，2004年），頁77-112。
- Sartre, Jean-Paul. 著，魏金聲譯，《影像論》（L'Imaginaire）（台北：商鼎文化出版社，1992年）。
- 艾德華·薩伊德（Said, Edward W）著，王志宏等譯，《東方主義》（台北：立緒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9年）。
- Boulding, Kenneth E.. *The Image: Knowledge in Life and Societ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56)
- Buruma, Ian. & Margalit, Avishai. *Occidentalism: The west in the eyes of its enemies* (New York: The penguin press, 2004)